

《世界如此危机》连载（二）

■ 高连奎/文

另外希腊危机也有其他原因，希腊面临债务危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失范的问题，研究发现，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西方的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国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而“欧猪五国”基本都是极端多党制。比如希腊危机爆发时的议会产生于 2009 年 10 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组成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160 人，新民主党 91 人，希腊共产党 21 人，人民东正教阵线 15 人，激进左翼联盟 13 人。爱尔兰也是极端多党制国家，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超过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众议院共有 6 个政党享有席次。在意大利，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 30 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中转站。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就越差，国家欠债也就越多，管理也最乱。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国家偿债，比如在美国虽然设定了政府债务上限，但这一上限在过去十年却被上调了 10 次，完全成了摆设。

希腊也是典型的极端多党制国家，这类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极差，其共有的表现就是黑社会横行，地下经济发达，偷税漏税严重。日本、意大利等极端多党制国家都是举世闻名的黑社会国家，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政治人物都难以上台，在意大利黑社会已经成长为第一经济支柱，同样希腊也是如此，比如希腊政府对人口走私问题置若罔闻，许多专门拐卖妇女儿童的黑蛇头都希腊当成了欧洲人口走私的中转站。

希腊地下经济规模巨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位居第一。希腊“全民逃税”，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 300 亿欧元，相当于 GDP 的 10%。据估计，不向政府纳税、不为职工办理任何保险、无法纳入政府正常经济统计系统的“影子经济”，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至 1/3。在希腊，如果病人上私人诊所看病，最好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另外，大多数医生不会给病人开收据，这样就可以逃税了。去年，希腊政府做过一项调查，在雅典一个高收入社区的 150 名医生中，超过 50% 的人说自己年收入少于 3 万欧元，甚至还有 30 多人居然说年收入少于 1 万欧元。这样的结果让财政大臣疑惑不解：就凭那么少的收入，你们怎么可能住豪宅、开名车、养游艇，还把子女送往贵族学校念书？希腊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说法：希腊是一个挤满了富有群体的贫穷国家。

政党越多的国家，选举越频繁，在意大利，总理的平均任期是一年，在日本也是“十年九相”。极端多党制国家的这种频繁选举，费用也非常高。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 200 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 GDP 的 8%。

另外希腊民主制度也导致公务员福利最高，因为西方国家都面临着民众投票热情不高的情况，很多大选民众投票率都不到一半，因此投票率较高的公务员成为了各政党争夺的票仓，因此都向公务员许以各种承诺，公务员待遇过高成为了多党制国家的通病。

在希腊公务员不仅有法律保障铁饭碗，他们还能享受超高福利，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 14 个月的收入，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58 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一年领取 14 个月的养老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公务员的待遇，而不是普通民众，我们很多媒体在说希腊高福利时都引用这个案例，其实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希腊，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占全国劳动人口的 10%，是英国这一比例的 5 倍，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劳动人口，希腊的比例会更高。因此希腊面临的不是“福利病”，而是“民主病”。

总之，希腊发生债务危机是多方面原因构成的，但这些原因没有一个是因为高福利导致的，因此高福利绝对不是头号因素，其他欧洲国家炒作希腊福利过高，其实是为希腊削减福利创造借口，这如同当年中国“入市”时将中国炒作成发达国家一样，背后都是舆论霸权在作祟。

但削减福利绝对不是上策，相反却是导致希腊经济衰退，迟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国际经验早就表明，一个国家福利越高，抗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当一个福利充足的 国家，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个国家就不会产生过度的需求萎缩，因此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现代社会经济危机发生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其危害程度也没有降低，但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那种灾难性局面，其根本就在于现

代国家都健全了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希腊在经济危机时发生了经济衰退，其实就是因为希腊的社会福利水平太低所致。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巴巴拉·韦斯说：“希腊这些南欧国家在失业保险方面，比欧洲大陆福利国家和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要少得多。这也是北欧福利国家在应对当前的危机时，远比希腊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后者则不能。当前希腊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持续衰退，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不是因为福利过高，反而是因为缺乏福利保障而导致的消费低迷。

但是，2010 年，丹麦赤字仅为 GDP 的 26%，政府债务规模从未超过 GDP60%上限，芬兰赤字仅占 GDP 的 2.5%，并且瑞典、挪威都有财政盈余。而且北欧很多真正的高福利国家都有着明星般的经济表现，因此福利并非关键因素。

福利国家真的效率很低吗？

福利社会不仅效率不低，而且很高，是目前人类创造的效率最高的发展模式，是真正的实行了自由、人权和效率完美统一的发展模式。

中国媒体和知识分子喜欢批判福利社会，他们最常用的理由就是福利社会养懒人，会造成社会低效率，但现实是福利社会并没有造成低效率，反而创造了其他任何社会都无法比拟的高效率，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

严格讲，北欧指的是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这五个国家。这些国家长年奉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发展策略，因此被称为“典型的福利国家”。

他们既没有富可敌国的富豪，也基本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人。这些国家，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瑞典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的 55%，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

在瑞典，由于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家庭只要一个人就业，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北欧国家，人们的中产阶级认同非常高，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尽管目前其中产阶级的比例还不到六成，但其国民对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高达 80%。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中产阶级统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收入进行统计，也就是将中等收入者都归为中产阶级，另一种是问卷调查形式，不考虑收入，只考察主观认同。两种方式比较起来，其实第二种更科学，因为有的国家将中产阶级的标准划分得过于宽泛，导致中产阶级人口虚多。

比如印度号称自己是中产阶级大国，但印度有将近一半的人是文盲，我们不敢想象，在文盲人口仍然占很大比例的国家，这种中产阶级人口数字有何意义；再比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11 年城市蓝皮书，称 2009 年我国城市中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 23 亿人。但是个税免征额提升至 3500 元之后，我国缴纳个税的人数骤减至约 2400 万人。尽管缴个税的并不一定就是中产阶级，但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而二者拉开了将近 10 倍的差距，可见中国的中产阶级数字也是多么的虚，而这些交个税的工薪阶层，恐怕也还有将近一半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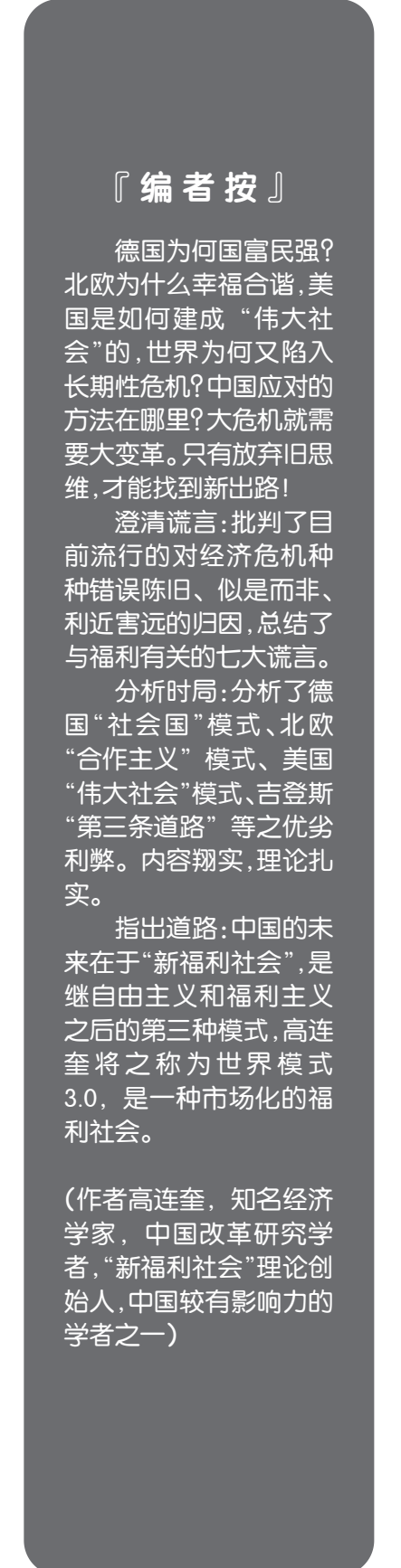
因此按收入统计中产人数意义不大，关键是民众的自我认同，一个人不一定收入很高，但如果自己感觉生活富足，没有巨大的生存压力，就会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相反，如果收入相对不错，但毫无生存安全感，那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所以在福利社会，由于社会保障完善，因此民众的中产阶级认同度都比较高。

重视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

从经济上来看，北欧国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来源于私有经济的无序性，因此北欧各国都普遍强调国家干预，强调国有化和国有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直接参与。这种经济方式被称为“混合经济”。

从社会层面来看，北欧普遍通过征税实行转移支付，瑞典的纳税人所交纳的平均所得税为其收入的 31%，而雇主税的税率为 33%。大公司的经理几乎要交 60% ~ 70% 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 85%。正是由于较高的税率，为各种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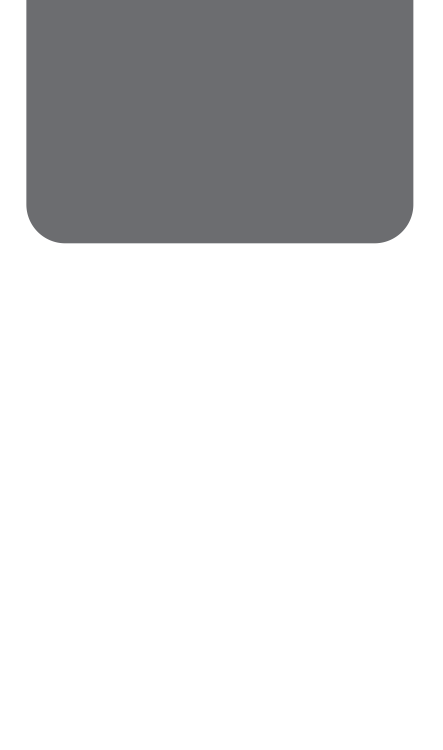


『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
北欧为什么幸福和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
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
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
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 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措施的结果是使瑞典的家庭都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财富分配更为均等，福利不再以慈善的形式出现。人人就业和终生就业，抵御了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享受文明人应有的生活标准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保护了社会的弱势群体，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过大，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这就是北欧特色。

北欧虽然分配均等，但是经济也不差，不仅不差，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而这样的成就却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取得的，因为这些国家几乎处于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理应经济最差，但由于措施到位，他们却成为了世界上经济最好的地区，经济危机前的 2008 年，北欧人均 GDP 均超 5 万美元，挪威甚至高达 95 万美元，即使是冰岛，其人均 GDP 也达 55 万美元，北欧五国中有四国人均 GDP 高于美国，而剩下的一个芬兰也与美国不相上下。

北欧也是世界上人均跨国公司最多的地

区，瑞典诞生了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沃尔沃汽车、萨博汽车和爱立信通信、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宜家家居和 H&M 服装等等。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在经济竞争力上，北欧五国也领先世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 2006 至 2007 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芬兰、瑞典、丹麦囊括第 2、3、4 名，挪威和冰岛则分占第 12 和第 14 名。在此之前，芬兰曾经连续三年夺冠。

北欧福利国家还是世界上民众幸福感最强的地区，2010 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的盖洛普幸福指数调查显示，来自北欧的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在受调查的 155 个国家中名列前四，感受幸福的人比例最高。

北欧是世界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在芬兰，在瑞典，无论是与政府官员交流、还是与大学教授座谈，无论是考察跨国企业生产线，还是聆听中小企业发展报告，创新一词，总是被高频度提起，并成为会议、报告、演讲中的核心内容。

北欧还是世界上“最自由化”的 10 个或 20 个经济体之一。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年度经济自由度数据，它由多个指标组成，包括税收、通胀、政府规模、工作自由、贸易自由，等等，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指数都很高。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要高。

北欧国家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国家，自 1995 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世界各国清廉状况排名，北欧国家其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前茅。北欧地区几乎各项指标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可以算是人类的模范世界。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北欧国家仍然祥和安定，人们安居乐业。

北欧国家如果效率很低，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北欧地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为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足以说明这一地区有着极高的效率。据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北欧虽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其市场经济并没有遭到破坏，也并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情况，民众也主要靠工资生活，因此民众并不会失去工作的动力。

其次，一个社会的进步是由最优秀的人带动的，最优秀的人，他们生活的动力是快乐和兴趣，而不是因为贫困，比如那些大企业家，他们家财万贯，但他们仍然相当的勤奋，也就是需要“被养起来”，才能创造出东西，如果整天为吃饭奔波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成就的，这就是福利社会的好处。福利社会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这样就有利于人们发挥自己的潜能。一个社会的进步主要取决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至于社会上有多少懒惰的人，根本无关，而且北欧人也不懒，这在后面的章节中有详细阐述。

第三，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贫富分化，而福利社会国家贫富差距比较小，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社会需求。

第四，福利社会可以避免经济周期，经济是存在周期的，经济周期对社会存在巨大的破坏作用，福利社会，在经济危机期间，社会需求并不会大幅度减小，因此整个不会遭遇经济周期的破坏。

第五，福利国家政府都比较廉政。美国兰德公司有关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政府廉洁自律总排名”中，芬兰、丹麦名列第一、二名。其中芬兰在近 10 年内有 7 年位居榜首，丹麦有 7 年位居前三，瑞典和冰岛均位列前十。北欧国家高级官员多数比较清廉。政府丑闻并不多见。

第六，北欧地区都奉行大政府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在应对全球化中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30 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经济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现代化经济和劳动力所需的必要投资。富有群体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然而，在北欧，国家利用高收税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局面，这是今天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对于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应该看到这一现实。

可惜的是，由于中国青少年接受的都是英语教育，留学都是去欧美的英语国家，以至于中国至今对北欧模式缺乏研究，有研究也只是皮毛性的了解，而非真正探讨其成功的背后因素，以至于我们整天听到的都是对北欧的污蔑和诅咒。

北欧模式和美国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竞赛，已经分出高下，中国应该向哪个学习，应

该心里有数了。

用富人慈善取代国家福利可行吗？

富人不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慈善捐款主要来自中产阶级，那些吹捧富人，鼓吹用富人慈善取代国家福利的说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现在中国有一种思潮就是“公民社会”思潮，很多人并不知道公民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会望文生义的将之理解为促进民主化，或是加强公民权利等，其实这都不是公民社会的本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直接用民主社会好了，为什么还要创造出公民社会这样一个词呢！其实公民社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小政府”，即用社会团体来分散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缩减到最小，具体到社会福利方面，就是用富人的慈善机构取代政府的福利，其实这就是“社会福利慈善化”。

“小政府”与我们所提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相反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相对来说也是大政府，而主张“小政府”的“公民社会”运行的结果必然是“打着公民的幌子坑害公民”。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越来越小，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替代不了政府，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才对，在没有政府管理的领域必然是“大欺小”，“强欺弱”的丛林社会。而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必然是大政府。

西方国家的政府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都比较小，各国都比较自由，比如美国在经济大萧条当中，顽固的胡佛拒不救济贫民，而是强调应由私人慈善机构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接受大富豪摩根的建议，实行了现在听起来都很好笑的“邻居互助”计划，也就是强制那些有工作的人去帮助没有工作的邻居，这一计划当然是失败的。现在流传比较广的数据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饿死了 800 万人，这一数据是否确切不得而知，但是当时的惨状是确实存在的，而这样的情况竟然是发生在一个耕地过剩，粮食充足的国家。

1933 年 2 月 15 日，还没有正式就职的罗斯福在乘车行进在迈阿密的大街上，突然，一个人一边大喊“快要饿死的人太多了”，一边朝罗斯福的汽车开火。虽然罗斯福最终安然无恙，但他明白，贫民正在用子弹向未来的总统倾诉饥饿。而且当时美国法西斯主义也已经开始泛滥，当时不少人宣称“美国只缺少一个希特勒”。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果断放弃了自由主义政策，而是加强政府救济，推出了大量的“以工代赈”的措施，美国的经济和民生才慢慢恢复，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也才渐渐确立了福利社会的基础。可以说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由大萧条期间饿死几百生命换来的成果。

那些指望用富有群体的慈善来替代政府福利的人是对历史愚蠢无知或是别有用心。的。无论是官办的慈善组织，还是民办的慈善组织，都不可能对社会起到太大的作用，“社会福利慈善化”所主张的“政府可以不搞社会福利，让富人群体多捐点款就行了，是完全错误的。社会福利可以替代慈善，但是慈善绝不能取代社会福利。慈善从根本上是政府福利不足所致，真正的好社会是不需要慈善存在的。

如果只进行理论探讨，也许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好富人”的案例，但现实根本不是如此，比如在美国中产阶级个人捐款占整个慈善捐款的 70%，慈善捐款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其实富豪更吝啬。

“美国富豪热衷于捐款”只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假象，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尽管富有群体的捐款远远小于中产阶层，但关于富豪捐款的新闻却占据了媒体的大部分版面，美国富豪捐款也只是公关手段而已，是为了取得好的社会形象。

社会只关注那些捐款最多的富豪，而少数富豪的慈善行为却给公众留下了一个美国富豪喜欢捐款的印象，而且美国富豪捐款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避税。

美国富豪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富豪照样也做不到。而且中国的富豪榜和慈善榜重合度非常低，中国做慈善比较出名的如陈光标、余彭年等都不是富豪榜上的常客。既然中产阶级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那当中产阶级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慈善就更难进行下去了，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就有很多慈善组织破产。

因此中国很多人所主张推行的“社会福利慈善化”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笔者认为中国慈善业的发展应该“推广直接慈善，做大政府慈善，放开民间慈善，用社会福利取代慈善”。

(待续)